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及响应战略研究

赵昌平, 郑米雪, 范厚明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要: 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演化的关键力量, 探索其演化进程与演化规律, 可为中国制定双边关系响应战略提供科学的指导。以贸易结合度和全球货物贸易网络的中心度为依据, 可将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分成五个关键阶段, 在各阶段中国对东盟的经贸的紧密关系保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且各阶段的响应战略是积极有效的。

关键词: 经贸关系; 演化; 进程; 响应战略; 复杂网络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7)07-0043-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已成为全球经济网络演化的关键力量, 全球经济网络的演化改变了中国—东盟的地位与影响力, 进而引发中国—东盟相关利益主体的心态、认知模式、民族情绪的变化, 各自会调整与改变响应战略, 其变化引起双边关系的变化, 使得双边经贸关系演化出现突变。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 科学评价双边响应战略的效果, 可为中国响应战略的规划与调整提供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国内外学者从国际关系、经贸发展、战略博弈等视角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问题。国际关系视角的学者们认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因素主要是美国、双边经济的不对称性、南海问题等因素, 对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发展的未来前景大多

持有乐观态度^[1-2]。依据中国与东盟签署的重要文件以及重要战略的提出时间,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可划分为全面对话框架建立阶段(1991—1996年)、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建设阶段(1997—2002年)、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和巩固阶段(2003—2006年)以及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2006年至今)四个阶段^[3-4]。经贸发展视角的学者们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回顾了双方贸易发展历程并对经贸前景做了一些预测, 认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差距在缩小, 但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非对称性、脆弱性与敏感性^[5-6]。战略博弈视角的学者们指出, 一些国际组织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双边博弈关系的稳定以及对中国主导权的影响^[7-8]。社会网络视角的学者们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44个主要城市的优势进行了比较^[9-10]。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带有复杂网络的特性, 它在复杂网络系统中不断演化, 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主导因素。但现有的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在历史阶

收稿日期: 2017-03-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极航线通航环境评价及海上突发事件响应机制研究”(61473053); 大连海事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北极航线与世界海运格局演变”(3132016361)

作者简介: 赵昌平(1973—), 男, 湖北洪湖人, 博士,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副教授; 郑米雪(1992—), 女, 山东曲阜人,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范厚明(1962—), 男, 山东蓬莱人,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段的划分依据上偏重于主观判断, 缺乏定量的指标依据; 二是对中国—东盟在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及社会资本以及相应的响应战略的效果缺乏深层次的评价; 三是没能揭示中国—东盟的响应战略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演化进程的影响机制; 四是对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演化趋势的判断没能给出科学的依据。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法研究了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的进化进程, 利用复杂网络的中心度指标与贸易结合度指标, 科学划分了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进程, 利用定量数据分析了中国—东盟的响应战略的效果。

二、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演化进程

国家间经贸关系的演化是双方依据自身战略需要、经济影响力以及环境现实条件不断博弈、调整响应策略的结果, 国家的响应战略会改变与影响一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 双边经贸的力量对比又会促进国家响应战略的调整^[1]。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化是中国与东盟不断调整响应策略, 不断依据双边经贸力量对比改变博弈策略的过程, 因而可以依据双方的经贸依存关系及双方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的演进过程进行阶段划分。贸易结合度是评价双方在贸易上相互依存程度的有效指标, 反映了双方间的贸易联系的紧密度, 能评价双方间的贸易关系强度, 它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响应战略的调整。在经济复杂网络中, 网络节点的中心度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心度越大表明节点在网络中的权利越大^[12]。全球贸易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 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网络拥有的社会资本与权力的大小能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贸响应战略的有效性^[13]。

本研究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选取了1992—2014年全球每年的货物出口贸易额的排名前20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将东盟十个成员国看成一个整体, 利用双边贸易关系来确定与构建全球货物的复杂网络(因每年的前20名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就占到了世界总出口额70%以上, 因此本研究构建的复杂网络能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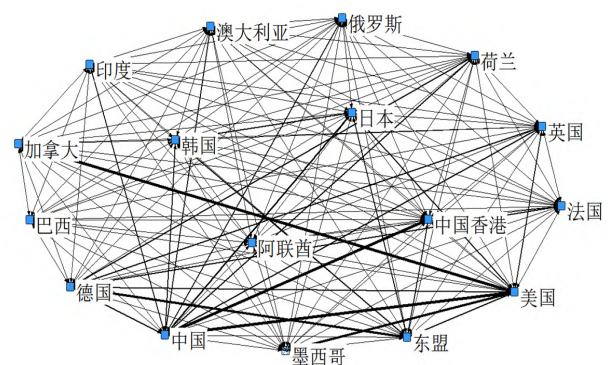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货物贸易复杂网络拓扑图

映全球货物贸易网络的特征)。网络图如图1所示。

利用UCINET6软件计算出度数中心度指标值与排名, 利用数据计算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指数^①, 具体如表1所示。

对表1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演化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中国弱势与非紧密依存期(1992—1997年)、中国弱势与紧密依存期(1998—2002年)、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2003—2007年)、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衰减期(2008—2012年)、中国强势与紧密依存调整期(2013年至今)。

(一) 中国弱势与非紧密依存期(1992—1997年)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低于东盟, 说明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不如东盟;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结合度小于1(1995年例外), 贸易结合度小于1说明两者间的贸易联系松散, 是一种非紧密依存关系。在这一阶段东盟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太稳定, 在第五位至第八位之间波动, 中国的地位较为稳定, 维持在第十一位左右的位置。

(二) 中国弱势与紧密依存阶段(1998—2002年)

中国与东盟贸易结合度指数都大于1, 而且呈上升趋势, 说明两者间的贸易联系在不断加强, 相互依赖度加大。在这一阶段,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一直小于东盟的度数中心度, 但在不断增加, 在全球货物网络中的影响力排名从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九位附近, 这说明同东盟贸易的联系紧密度的增强, 对我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起到了提升作用; 东盟的度数中心度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排名也从第

①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 该比值反映了两国贸易相互依存的程度, 其计算公式为: $TCD_{AB} = \frac{X_{AB}/X_A}{M_B/W_W}$, 其中, TCD_{AB} 为A、B两国的贸易结合度, X_{AB} 为A国对B国的出口额, X_A 为A国出口额, M_B 为B国进口额, W_W 为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 数值越大, 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 数值越小, 则贸易联系越松散。

五位降到了第六位；这一阶段，中国与东盟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差距在不断缩小。

(三) 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2003—2007年)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已经超过东盟的，在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从第九上升到第四或第三的位置，中国的经贸实力不断增强；在这一阶段中国对东盟贸易结合度不断增加，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在不断增强。东盟的度数中心度出现一定的波动，但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在第九位与第七位之间波动；东盟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不断增加，并且都大于1，说明东盟对中国的贸易联系在不断增强；这种贸易联系的加强关系有效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四) 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衰减期(2008—2012年)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不断增加，变为最大，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继续提升排到第一位的位置；中国对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持续上升，这说明中国在强化同东盟的贸易联系。东盟的度数中心度整体呈稳定增加趋势，排名跃升到第五位，这说明这一时期东盟调整了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增强了它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五) 中国强势与紧密依存关系调整期(2013年至今)

中国的度数中心度保持稳定，在全球货物贸易

网络中仍排在第一位的位置，对东盟贸易结合度继续增加，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依存度继续增加。在东盟方面，贸易结合度有微弱下降，度数中心度增加较快，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维持在第六位至第四位的位置。说明东盟国家有意识地调整了与中国的贸易紧密联系关系，增强了同其他伙伴的贸易联系，提升了它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三、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复杂网络演化进程的各阶段响应战略的效果分析

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演化的五个阶段，中国与东盟采用了不同的响应战略与策略，这些响应策略作用到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使全球货物贸易网络因中国—东盟的战略博弈朝不同的方向演化，不同的响应战略所产生的效果也存在差异。

(一) 中国弱势与非紧密依存期(1992—1997年)

中国加大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加强了同东盟、日本、美国、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联系，但中国将响应的重点放在了国内引资与经济增长上，在贸易伙伴上更注重欧、美、日，没有将重点放在与东盟的经贸联系上，中国采用了相对被动的响应战略，它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地位(比较表1、2的数据得出该结论)，一定程

表1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和复杂网络的中心度统计表

年份	指标	中国对东盟 贸易结合度	东盟对中国 贸易结合度	中国度数 中心度	东盟度数 中心度	中国 排名	东盟 排名
1992		0.949	0.951	50	81.25	10	5
1993		0.906	0.950	58.824	82.353	9	5
1994		0.940	1.038	58.824	76.471	10	7
1995		1.076	1.269	47.059	70.588	12	8
1996		0.832	1.044	52.632	84.211	11	5
1997		0.960	1.264	55.556	77.778	11	5
1998		1.097	1.449	55.556	77.778	10	7
1999		1.119	1.351	61.111	77.778	10	7
2000		1.254	1.436	63.158	78.947	10	8
2001		1.337	1.446	66.667	77.778	9	7
2002		1.405	1.605	66.667	77.778	9	6
2003		1.337	1.734	84.211	78.947	4	7
2004		1.396	1.714	84.211	73.684	4	9
2005		1.362	1.726	84.211	78.947	5	8
2006		1.403	1.734	89.474	78.947	3	7
2007		1.487	1.767	89.474	73.684	3	7
2008		1.514	1.628	94.737	78.947	3	6
2009		1.585	1.590	94.737	73.684	3	6
2010		1.453	1.583	100	78.947	1	6
2011		1.478	1.597	100	84.211	1	5
2012		1.520	1.529	100	78.947	1	5
2013		1.667	1.491	100	78.947	1	6
2014		1.768	1.490	100	94.737	1	4

表 2 中国—东盟经贸网络的中心度指标表

年份	指标	中国接近中心度	东盟接近中心度	中国中间中心度	东盟中间中心度	中国特征向量中心度	东盟特征向量中心度
1992		66.667	84.211	0.278	3.905	28.86	41.496
1993		70.833	85	0.289	3.307	33.32	41.321
1994		70.833	80.952	0.473	2.442	33.972	40.008
1995		65.385	77.273	0.105	1.951	26.819	37.228
1996		67.857	86.364	0.146	3.386	29.25	40.169
1997		69.231	81.818	0.586	2.995	30.415	38.653
1998		69.231	81.818	0.699	2.79	28.962	37.641
1999		72	81.818	0.967	2.404	32.056	38.395
2000		73.077	82.609	0.927	2.993	31.541	36.874
2001		75	81.818	1.706	3.429	34.104	38.17
2002		75	81.818	1.751	3.792	34.007	37.748
2003		86.364	82.609	4.669	3.556	38.231	36.577
2004		86.364	79.167	4.402	2.518	38.412	35.312
2005		86.364	82.609	3.946	3.159	38.11	36.291
2006		90.476	82.609	5.449	2.807	39.886	37.036
2007		90.476	79.167	6.574	2.203	40.762	36.779
2008		95	82.609	7.866	3.396	42.935	38.594
2009		95	79.167	8.122	2.94	43.086	36.594
2010		100	82.609	7.795	3.225	43.637	36.975
2011		100	86.364	7.728	3.911	44.261	39.783
2012		100	82.609	8.855	3.315	44.75	38.55
2013		100	82.609	8.696	2.968	44.379	38.513
2014		100	95	7.541	6.142	43.972	42.532

度上提升了中国的社会资本。东盟在这一阶段采取了更主动的响应战略,1992年东盟提出了要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1996年东盟将中国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东盟又举办了东盟与中、日、韩第一次首脑非正式会议。东盟在这一阶段处于主动、强势地位,通过将东盟作为整体来同大国进行博弈,获得博弈中的主动权,东盟的响应战略有效提高了它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比较表1、2的数据得出该结论)。由此可见双方的响应战略都具有合理性,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主动响应的战略让东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与网络控制权。

1992—199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结合度从不紧密向紧密过渡阶段,是中国利用东盟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的过程。

(二) 中国弱势与紧密依存阶段(1998—2002年)

中国意识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性,采取了更为主动的响应战略,积极融入亚洲经济与世界经济,在1999年参加了“东盟+3”的领导人会议,达成了东亚合作意向;同时与美国、欧盟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0年提出了建立更加互惠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倡议,2002年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采取的响应战略极大推进了亚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表1、表2的数据可知,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网络社会资本与影响力不断增加,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缩小了同东盟的差距,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紧密度不断增加。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盟将精力主要放在重振经济、降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上,采取的响应战略相对被动,从相关数据来看虽然东盟的社会资本维持了稳定,但它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一定影响,出现了下降。因而东盟采取的响应战略没能产生积极影响,效果不是很显著;中国采取主动融入的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主动响应的战略能产生更积极的结果。

(三) 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2003—2007年)

中国与东盟都意识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性,加快了建设步伐,2003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协议,明确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到2006年实现了500多种农产品的免税,2004年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进入实质建设阶段,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双方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双方的经贸联系紧密度不断增强。双方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提高了双方在全球经济网络

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增大了双方在货物贸易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具体数据见表1、表2。这反映出和平环境、共同的经济合作意愿、积极的响应战略能产生双赢的结果,能有效提高双方的社会资本。

(四)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衰减期(2008—2012年)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将响应战略重点放在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上。中国在这一阶段采用了更积极的响应战略,一方面同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正式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时也启动了中韩自贸区的谈判,加强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来促进贸易的发展,这些响应战略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地位及控制力,度数中心度不断增大,对东盟的出口不断增加,出口依赖度增加。东盟在此阶段调整了相应战略,在与中国共同建设自贸区的同时,也同日本、韩国签订建设自贸区的协议,同时这一时期美国加入TPP协议谈判,东盟同北美、南美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东盟的这些响应战略降低了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与紧密联系度,同时也提高了东盟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与影响力,其度数中心度增加,排名也上升到第五位。东盟的大国平衡的响应战略对它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平衡战略对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中国风险、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如南海问题的谈判力。

(五)中国强势与紧密依存关系调整期(2013年至今)

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新趋势,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经济结构亟须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201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4年开启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谈判,中国加大对东盟的投资与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赋予了东盟更高的权重,给予更多关注,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依赖度与经贸联系紧密度增加。积极的响应战略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为经济与社会转型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东盟方面,一方面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入亚投行,获得与中国合作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历史情结与恐惧心态的作用下,同时受大国平衡思维的指引,东盟积极响应美国主导的TPP协

议,菲律宾激发南海问题,引起中国与东盟关系紧张,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部分东盟国家因担忧中国的复兴会引起国际金融、经济中心的转移,主导东盟在经济上向欧美靠拢,与中国在经济上保持距离。东盟在这一时期的响应战略的调整,提高了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其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不断增加,特别是2014年东盟的度数中心度增幅较大,而对中贸易结合度继续减小。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经历了五个关键的演变阶段,在划分依据不同的前提下,本研究的前三个阶段时间节点同已有的研究成果保持了一致性,为已有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定量支撑。后两个阶段的划分能更准确地判断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演变的趋势,为中国响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从响应战略的效果来看,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对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有较好的效果,采取主动响应的国家比采取“被动”响应的策略方在全球经贸网络中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中国自1998年以来一直采取积极主动的响应战略发展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关系,这种响应战略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控制权,为中国谋求与东盟政经关系博弈的主动权奠定了基础。

从演化过程来看,建立与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东盟双边经贸关系的核心响应战略。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结合度不断增加,东盟对中国的出口结合度则不断下降;这说明“自贸区”的响应战略的产出效应具有不对称性,对复杂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与影响力大的节点更有利。

在东盟弱势与紧密依存加强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为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双方围绕经济发展签订了系列的合作协议,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与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结构洞等社会资本指标都出现增长,并且出口贸易结合度与中心度排名呈现同向变化。这说明和平的政治环境,双方在经贸战略响应的合作方面的投入越大,双方的经贸联系紧密度及

经济体在复杂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越大, 响应战略的效果越明显。

自2013年以来, 中国与东盟双方都对双边关系的响应战略进行了调整, 这种调整使东盟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跃升, 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特征向量中心度值接近中国, 排名跃升, 影响力与控制权增强, 它增大了东盟与中国的政经博弈的话语权, 东盟可能会因此而进一步消减对中国经贸联系紧密度的赋权, 增大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政经风险。

(二) 讨论

全球经济与贸易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具有典型的复杂网络特征, 网络的关系结构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国家与地区间的相互关系与力量对比。中国与东盟是全球经贸网络的关键节点, 它们的经贸关系的变化可用网络的相关指标来反映。历史数据与资料收集的广泛度可能会影响社会网络的构建与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 但网络规模的大小不会改变节点的关系结构与力量对比, 总体趋势具有一致性与合理性, 本研究选取全球货物贸易前20强(东盟看成一个整体)的22年数据, 能真实反映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演变过程。

复杂网络系统具有鲁棒性, 这种特征使网络具有抗扰动与外来冲击的特征。全球货物贸易网络的鲁棒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在较长时间内具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南海问题等对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 但不会左右中国—东盟经贸上的紧密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大局, 在未来10年, 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仍是紧密联系的关系,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仍会大于东盟的影响力。

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贯性与持续性, 东盟会通过重新赋权、重新连接等方式来调整它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关系结构, 通过建立新的自贸区等方式来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经贸赋权, 增强其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影响力。因而我国应注意东盟的这种响应趋势, 利用我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影响力与社会资本, 通过调整“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投入, 继续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 扩大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等方式来加强与东盟的经贸联系, 掌控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

从演化过程来看, 中国对东盟的经贸的紧密关系保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它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货

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使其社会资本不断增加。这说明中国的响应政策是积极的、有效的; 这种响应政策的有效性与中国政权的稳定与开放政策的连贯性有关。虽然我国的复兴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围堵, 但经济网络演化的主旋律是合作、开放、共享, 我国要以开放、合作、创新的战略定性来响应这种围堵, 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 [1]徐善宝.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多边关系发展的若干特点[J]. 东南亚研究, 2005(4): 32-35.
- [2]李一平.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探析[J]. 世界历史, 2004(5): 33-39.
- [3]欧阳欢子.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前景[J]. 区域与国别经济, 2008(9): 72-78.
- [4]叶刘刚, 白福臣, 尹萌.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变迁: 1992—2012[J]. 东南亚研究, 2015(1): 33-41.
- [5]邓杨丰. 中国—东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J]. 学术论坛, 2014(6): 34-39.
- [6]薛芳.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07(3): 28-30.
- [7]Tai W L. ASEAN Coping Mechanisms to Manage the Rise of China[J]. East Asia, 2008, 25(4): 407-422.
- [8]王森, 杨光海.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J]. 当代亚太, 2014(1): 35-57.
- [9]杨崇蔚. 在“关系治理”上更进一步——《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评析[J]. 国际观察, 2016(1): 52-65.
- [10]梁经纬, 文淑惠, 方俊智. 中国—东盟自贸区城市群空间经济关联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视角[J]. 地理科学, 2015(5): 521-528.
- [11]潘峰华, 赖志勇, 葛岳静.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应用[J]. 经济地理, 2013(7): 15-21.
- [12]Maoz Z. Network Polarization, Network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2002[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6, 43(4): 391-411.
- [13]陈银飞. 2000—2009年世界贸易格局的社会网络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11): 31-42.

责任编辑: 靳晓斌